

西方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的新方向

李樹熙

Department of History
Pace University in New York

提要

九十年代以來海外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方興未艾，成果衆多。本文旨在評論這一時期以英語出版的、建立在中外官方檔案和地方文獻基礎上、分析15到20世紀中國基督教群體的一些代表著作。這些著作涉及領域廣泛，諸如傳教活動、集體入教、地方教案和政教關係等，關注的時段和具體地域不盡相同，但是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體現了三個共同的研究旨趣：即突出「本土化」（inculturation）強調研究中國傳教信教群體、突出「地方化」（localization）發掘教會和地方社會關係、和突出「網絡化」（networking）研究跨國跨地區的傳教活動等。本文圍繞上述三個中心概念，深入梳理相關的研究成果，希望能為中外學術交流作一點貢獻。

關鍵詞：基督教、本土化、地方化、網絡化

一、引言

基督教來華一直是中西關係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其中以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互動關係最受學者關注。¹ 近年許多海外學者利用中外官方檔案、傳教機構檔案、地方史料和田野調查，借鑒人類學研究方法，試圖將研究的重點從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反教士紳轉移到入教的平民百姓身上，藉此了解民間社會芸芸眾生的生活歷程和入教經過。正如裴士丹（Daniel H. Bays）所說，「這種微觀式的社會歷史研究，反映出學者對中國社會基督教群體和中文官方檔案及民間原始史料的重視。」² 就學術理論來說，學者試圖打破「西方中心論」、「帝國主義侵華論」、「中西文化衝突」和「挑戰與回應」等理論架構，重建吉爾茲（Clifford Geertz）提倡的「地方觀點」（a native point of view）和建立一個以中國基督教群體為中心的歷史觀。³ 就研究方法來看，學者以區域史和社區史研究的方法，把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建立的教會村落放置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進行考察，探討基督教群體的興起和發展，並了解基督教與中國社會互動時出現的協調和衝突。最終的目的是要寫一部以基督教群體為中心的社會歷史。

本文旨在評論1990年代以來以英語出版的、利用中外官方檔案和地方文獻分析從明清兩代到現代中國的基督教群體的一些代表著作。這些著作涉及的研究課題十分廣泛，諸如傳教活動、集體入教、地方教案和政教關係等，它們關注的時段和具體地域不盡相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著作有共同的研究取向，即它們集中於基督教群體與地方勢力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是一個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反覆出現的問題。本文將借助「本土化」（inculturation）、「地方化」（localization）和「網絡化」（networking）等三個概念搭建起來的分析框架，評論相關的研究成果。首先，本文借用「本土化」這一概念，分析有關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融入中國地方社會的主要觀點。其次，本文討論基督教群體地方化的過程，當中涉及基督教群體與宗

1 文中「基督教」（Christianity）一詞，乃指天主教（Catholicism）和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而「基督教群體」（Christian communities）乃指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建立的教會村落。

2 Daniel H. Bays, "Introduction,"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ed. Daniel H. Bay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vii.

3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族、寺廟、不同民族和地方精英的權力關係。最後，本文著眼於基督教群體跨地域網絡的形成和整合，以及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基督教群體面對的新挑戰。

二、基督教本土化

在海外有關基督教本土化歷史的研究中，學者把注意力從「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等中西文化交流的問題轉移到基督教在中國地方社會的變遷及其發展成爲民間宗教的過程。正如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所言：「即使以學術交流作爲傳教方式的耶穌會，也並非是一個只吸引中國上層士大夫的傳教團體。耶穌會傳教區內的信徒大多是一般的平民百姓。」⁴ 有鑒於此，學者通過地方社會視角了解中國知識階層和一般百姓的入教現象，並重新審視近代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內的「三自運動」。主要的觀點如下：

第一、有關中國知識階層對基督教的回應，以明清兩代天主教歷史的研究最爲突出。謝和耐（Jacques Gernet）從文化衝突的角度強調以天主教價值觀念爲核心的歐洲文化與中國文化絕對不能相容⁵，但鐘鳴旦以明末杭州仁和天主教徒士大夫楊廷筠爲個案，分析在楊廷筠思想中天主教教義與儒家學說的融合過程，由此修正了謝和耐的觀點。⁶ 另外，齊皎翰（Jonathan Chaves）和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先後研究有關天主教與儒家文化融和的問題。前者分析明末清初江蘇常熟天主教詩人吳歷的個人宗教情懷，指出吳歷透過創作詩詞來表達天主教信仰和儒家文化的相同之處。⁷ 後者則探討清初杭州地

4 Nicolas Standaert, "Christianity as a Religion in China: Insights from *The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Cahiers d'Extrême-Asie* 12 (2001): 9; "New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83.4 (October 1997): 573-613.

5 Jacques Gernet,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6 Nicolas Standaert, *Yang Tingyun,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 His life and thought* (Leiden: E.J. Brill, 1988); "Christianit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 as a Case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Burdened Past, Hopeful Future*, ed. Stephen Uhalley and Xiaoxin Wu (Armonk: M.E. Sharpe, 2001), 81-116.

7 Jonathan Chaves, *Singing of the Source: Nature and God i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Painter Wu L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David E.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區天主教徒士大夫在政治動盪的時局中以天主教教義來回應種種的衝擊。由此可見，在明清鼎革的過程中，國家政治秩序的瓦解為天主教的傳播提供了空間。

第二、天主教與中國民間文化相容的現象，可見於地方社會的天主教宗族組織和禮儀活動。在清初國家政權仍未鞏固和國家對地方基層社會控制薄弱的大環境下，天主教村落不斷發展。梅歐金（Eugenio Menegon）指出，天主教的一神信仰、誦經和禁止偶像崇拜等禮儀迅速地融入閩東的地方社會，更成為當地天主教村落群體的日常生活的重要部份，而一個以閩東社會為基礎的天主教教會亦得以順利建立。⁸ 但當國家權力鞏固，不斷地利用文字（例如科舉）和國家禮儀（例如旌表節孝和地方祭祀等）在地方社會進行教化，力圖使官方的意識形態普及民間。在國家宣揚的「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等價值觀念廣泛地深入民間的大環境中，閩東地方上的天主教村落群體唯有利用官方允許的宗族機制來作為整合教會的手段，建立天主教宗族（Catholic lineages），從而達到自保的目的。天主教宗族的主要特點是，宗族內的族人以天主取代祖先加以供奉、以宗族模式強化同姓教徒群體之間的關係，並通過宗族機制分配地方教會內部的資源，這種「教會—宗族」模式一方面解決了17世紀「禮儀之爭」所引發的祖先崇拜和宗教信仰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利用了官方認可的渠道來鞏固教會的發展。

第三、集體入教（Mass Conversion）是天主教在地方社會傳播時出現的普遍現象，尤其在偏僻地區，正統思想薄弱為天主教提供了極大的活動空間。狄德滿（R. G. Tiedemann）根據清代中葉華北地區天主教的發展，指出當地天主教教徒是來自民間秘密教門的成員，他們為了追求精神上的救贖和逃避地方官府的通緝而紛紛入教，這可證明天主教群體和秘密教門的密切關係。⁹ 另外，勞曼（Lars Peter Laamann）和孟德衛分別指出中國內陸地區的天主教群體在沒有西方傳教士支持的孤立處境中，進一步深化他們的宗教信仰，使天主教和鄉村風俗融合，並發展成為地方天主教村落。¹⁰

8 Eugenio Menegon, "Ancestors, Virgins, and Friars: The Loc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Late Imperial Mindong (Fujian, China), 1632-1832,"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2.

9 Rolf Gerhard Tiedeman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Heterodox Sects': Mass Conversion and Syncretism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44 (1996): 339-382.

10 Lars Peter Laamann, *Christian Here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Inculturation of*

第四、天主教的婦女守貞觀念，對地方社會產生複雜的影響。中國社會的本土婦女貞操理念中，一方面規定了所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式的婦女婚嫁觀念，這跟天主教教會所提倡教內男女「從幼慕道，立志守貞」的教導是互相抵觸的。梅歐金指出，天主教的婦女守貞觀念隨着多明我會從菲律賓賓傳入閩東福安地區，傳教士又建立貞女會，吸引大批不願意屈服於傳統婚姻制度而甘願守身不嫁的婦女。圍繞婦女的婚嫁和守貞，清代地方社會中多次出現官府迫使守貞女出嫁，或者抨擊守貞女的現象，這都構成了地方反教言論的重要組成部份。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中的守貞觀念還包括源自宋明理學婦女「從一而終」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原則，這在一定程度上，和天主教的守貞觀念又有相輔相成之處。以閩東社會為代表，天主教家庭和宗族對虔誠修道的婦女守貞不嫁大多報以尊重的態度。¹¹ 安德曼（Robert Entenmann）在對四川的貞女會的研究中，也提到一位名叫楊亞格納的女教徒因聘夫早逝而守貞，當她五十歲時，她的父親準備將她守貞行為上報地方官。¹² 這種以儒家禮法將天主教守貞行為納入官方的「列女傳」的情況，並沒有在閩東福安地區出現。這個個案顯示出天主教與方社會相容存有地域上的差異。

第五、有關近代基督教新教本土化的研究，以東南沿海地區教會的區域史最為突出。陳貽強（David Cheung）從中國教會自傳、自治和自立的角度指出，福州地區基督教群體早已在1860年代，建立近代中國第一所有別於英美傳教士系統的閩南基督教新教教會，並以羅馬字母出版閩南語的聖經、詩歌和教內通訊。¹³ 類似的傳教模式亦在台灣和廣東潮汕、客家地區出現。這種以羅馬字母出版方言聖經的傳教方法直接將基督教和族群身份聯繫起來，並促成中國東南地區方言教會形成的格局。¹⁴ 這一觀點突顯出中國基督教群

Christianity in Eighteenth-and-Early-Nineteenth-Century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Forthcoming); David E. Mungello, *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in Shandong, 1650-1785* (Lanham: Row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11 Menegon, "Ancestors, Virgins, and Friars", 269, 327-333.

12 Robert Entenmann, "The Institute of Christian Virgins,"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ed. Bays, 184 an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ites in Eighteenth-Century Sichuan," i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eds. Uhalley and Wu, 127-136.

13 David Cheung,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Native Church* (Leiden: E. J. Brill, 2004).

14 George A. Hood, *Mission Accomplished?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Lingtung*,

體內部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以上的海外研究成果強調，如果要了解「基督教本土化」的過程，就必須着眼於中國基督教群體在中西文化相容中扮演的積極角色，並透過地方視野探討基督教文化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過程。

三、基督教地方化

要了解「基督教地方化」的過程，就必須研究基督教群體與不同地方勢力的權力關係，這大概也是近年海外學者重新審視近代中國教案問題的一個重要方向。下文按照宗族、寺廟、民族和政治精英等地方勢力來回顧相關的研究成果。

明清以來華南一帶的社會組織不少以宗族的形態出現，大部份的村落屬於單姓或複姓的宗族鄉村。同一宗族的村民供奉同一祖先，宗族成員共同組織和負擔祭祀和修建宗廟等活動。這些活動將神權、鄉權和族權結合在一起，鞏固了宗族的重要地位。華南地區基督教群體和宗族組織是緊密聯繫的。李樹熙以廣東潮汕地區的教會村落為對象，探討宗族派系利用基督教作為新的政治手段，積極地參與宗族內部的利益整合。以往的研究強調爆發於宗族之間的種種利益衝突，例如械鬥就是不同宗族爭奪地方社會控制權的一種暴力表現形式。作為權力資源之一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不可避免的也捲入到宗族衝突之中，李樹熙指出，19世紀潮汕地區的集體入教就和械鬥等現象有直接的關係。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宗族內部的利益糾葛也是地方政治和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份。李樹熙強調在地方社會裏，宗族內部衝突和宗族之間矛盾同樣複雜。首先，每個宗族內部大多由不同類型、不同階級和不同信仰的社群交疊組合而成，調整同一宗族內部的利益群體的關係是保持宗族內聚的重要任務。其次，雖然宗族成員生活地域相同，但是不同的經濟地位和社會背景決定了他們在地方權力結構中處於不同位置。因此群體內部成員既有團結統一的期望，也有因私人利益而出現的矛盾和分裂。每當出現糾紛時，宗族成員可以通過互相協調和角逐來重整內部關係。當基督教順利進入潮汕地區以後，宗族內部的不同派系利用加入基督教增加自身的政治籌碼，又倚靠西方傳教士和其他地方教會的關係，與宗族以外的教徒結成一個

跨越宗族、血緣和地區的教會網絡，並繼續參與地方利益衝突。¹⁵ 類似的情形亦在廣東客家地區出現，魯晞珍（Jessie G. Lutz）和她丈夫（Rolland Ray Lutz）的著作是我們了解清末客家地區的村落械鬥、社會風俗和集體入教的切入點。¹⁶

在華北地區，民間宗教大多採取跨村網絡進行傳播，多個村落共同供奉某個神明，共同組織集體祭祀和寺廟修建。這些集體活動既穩定了寺廟對鄉村社會的領導和控制，又將神權和鄉權結合起來。李仁杰（Charles A. Litzinger）着眼清代直隸地區，指出當地民教衝突都涉及天主教群體和寺廟之間的糾紛。當天主教群體拒絕參與地方上的集體宗教祭祀活動，他們便被視為社會和文化異類，他們的行為危害到鄉村社會內部的團結和穩定，因而受到其他村民的排斥和攻擊。¹⁷ 類似的觀點亦見於史維東（Alan R. Sweeten）有關江西地區的教案研究和狄德滿對於山東地區義和團運動興起前後的民教衝突的分析。¹⁸

-
- 15 Joseph Tse-Hei Lee, *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Christian God and Hostile Communities: Collective Violence in Northeast Guangdong," in *Dragons, Tigers, and Dogs: Q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the Boundaries of State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Jane Kate Leonard and Robert J. Antony (Ithac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02), 213-243; "Testing Missionary Archives against Congregational Histories: Mapping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Exchange: Journal of Missiological and Ecumenical Research* 32:4 (2003): 361-377.
- 16 Jessie G. Lutz and Rolland Ray Lutz, *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850-1900, with the Autobiographies of Eight Hakka Christians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M.E. Sharpe, 1998).
- 17 Charles A. Litzinger, "Temple Community and Village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 Evidence from 'Sectarian Cases' (*Chiao-an*) in Chihli, 1860-1895,"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983; "Rural Religion and Village Organization in North China: The Catholic Challeng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ed. Bays, 41-52.
- 18 Alan R. Sweeten, *Christianity in Rural China: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1860-1900*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Rolf Gerhard Tiedemann, "Rural Unrest in North China 1868-1900: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South Shand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1; Tiedemann, "Baptism of Fire: China's Christians and the Boxer Uprising of 1900,"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4:1(January 2000): 7-12; Tiedemann, "Conversion Pattern in North China: Sociological Profiles of Chinese Christians,

在眾多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如台灣、蒙古、雲南和貴州，教案問題跟當地漢族移民與少數民族的糾紛有關。清末台灣的原住民中出現集體入教行為完全是爲了自保的需要，目的是利用西方傳教士的力量來抗衡不斷向高山地區擴張的漢族移民。¹⁹ 在蒙古出現的天主教群體大多以漢族移民爲主，這些漢族移民借助傳教士的力量來抵制蒙古地區的傳統政治勢力，以達到開拓荒地和控制水源的目的。²⁰ 在雲貴一帶，苗民以入教來抵抗當地漢族的擴張，但有一部份苗民相信基督教中的救主耶穌跟苗民傳說中的「苗王」有相似之處，於是紛紛入教。²¹ 當基督教成功地進入這些邊陲地區之後，當地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有所改變，發展成爲地方上一個新的宗教。

另外，Ryan Dunch 將焦點轉移到清末民初福州地區基督教群體與地方政治精英的權力關係。他指出黃乃裳等多位教會領袖利用基督教去改良地方社會和推動革命活動，企圖在劇變的時局中取得一定的政治影響力。²² 這種基督教救國方式，與中國傳統士大夫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實屬同出一轍。

綜合來說，以上的研究強調，基督教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既反映了中國地方社會內部的不同階層以入教作爲增加自身利益的策略，借助外來力量去整合原來的社會秩序和重建社群的內部聯繫，也說明基督教成功地進入了地方社會和發展成爲一股新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力量。

1860-1912,” in *Authentic Chinese Christianity: Preludes to Its Development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eds. Ku Wei-ying and Koen De Ridder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7-133.

19 John R. Shepherd, “From Barbarians to Sinners: Collective Conversion among Plains Aborigines in Qing Taiwan, 1859-1895,” *Christianity in China*, ed. Bays, 120-137.

20 Patrick Taveirne, *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Hetao), 1874-1911*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and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1 Cheung Siu-Woo, “Millenarianism, Christian Movements, and Ethnic Change among the Miao in Southwest China,”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ed. Stevan Harrell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217-247; T’ien Ju-K’ang, *Peaks of Faith: Protestant Mission in Revolutionary China* (Leiden: E.J. Brill, 1993); Ralph R. Covell, *The Liberating Gospel in China: The Christian Faith Among China’s Minority People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1995); Covell, “Christianity and China’s Minority Nationalities—Faith and Unbelief,” i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eds. Uhalley and Wu, 271-282.

22 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otestant Revolutionaries in Fujian, China, 1901-1911,” *Asian Profile* 31:5 (October 2003): 361-373.

四、基督教網絡化

在海外關於基督教群體網絡的討論中，學者着眼於基督教網絡與海外移民的關係，以及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中，基督教群體與國家權力的互動過程。

早在百年禁教期間，清政府禁止外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因此在鴉片戰爭之前，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向中國人傳教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東南亞地區的海外華人，再依靠他們將基督教間接向中國內地傳播。李樹熙指出，在1860年以前，基督教新教傳教士活動的中心是東南亞的華人群體，在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並不是傳教的重點地區。美國北方浸信會則完全依賴往來於汕頭、香港和曼谷之間的潮州移民和商業網絡來擴展教務。²³ 這種通過華人跨國網絡的傳教方式，同樣也出現在東南亞和南非的廣東人、客家人和閩南人的群體之中。²⁴ Kenneth J. Guest 把注意力轉移到1990年代福州地區基督教群體的海外移民網絡，他指出，大批福州人基於經濟原因移民北美紐約市華埠，這些移民通過教會建立橫跨紐約和福州的移民網絡，將大批資源從北美的福州人基督教群體送回福州地區，以發展地方教務和經濟。另外，他強調紐約市華埠地區的福州人基督教群體，不是團結一致的宗教社群，他們往往因為階級的差異而產生種種內部矛盾和紛爭。²⁵ 澳兩項研究突顯出中國基督教群體的海外宗教網絡基本上跟一般華人跨國移民和商業網絡緊密相連。類似的觀點亦見於楊鳳崗對大陸和台灣留美華人基督教群體的社會學研究。²⁶ 自1979年經濟改革和政治開放以後，強大的社會主義

23 Joseph Tse-Hei Lee, "The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 and Early Baptist Missionary Movement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Historian* 63:4 (Summer 2001): 752-768.

24 Eriberto Patrick Lozada Jr., *God Aboveground: Catholic Church, Postsocialist State, and Transnational Processe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7-50, 69-70; Jean-Paul Wiest, "Catholic Activities in Kwangtung Province and Chinese Responses, 1848-1885,"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7, 46-67; Wiest, "Was the Christian God Partial to the Hakka People," in *Authentic Chinese Christianity*, eds. Ku and De Ridder, 87-105; Arthur Song, "The Effects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on the Chinese Cult of Ancestors as Practised in the Johannesburg Area,"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urban-Westville, South Africa, 1989.

25 Kenneth J. Guest, *God in Chinatown: Religion and Survival in New York's Evolving Immigrant Commun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26 Fenggang Ya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國家向民間社會下放部份的權力，基督教群體運用既有的文化資源（例如血緣、宗族、族群等）來重建教會組織和恢復宗教活動。這種基督教群體的再生現象，存有地域性的差異。根據鄭明真（May Ming-Chun Cheng）對廣東省內基督教群體的調查和 Eriberto Patrick Lozada Jr. 對「小羅馬」客家天主教村落的的研究，廣東地區的基督教群體認識大批定居在香港、澳門及海外的親人和教友，這一個跨地域和跨國界的社會網絡，完全是倚靠宗教和族群身份去維繫，地方幹部對於這種可以引入海外資源的宗教網絡都欣然接受。²⁷ 這個現象既印証了 Nicole Constable 有關宗教和族群身份維繫着香港新界地區客家基督教「崇謙堂」的內部聯繫的觀點，更顯示出基督教群體技巧地利用宗教和族群身份在與國家權力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地塑造自身的地位。²⁸ 相比之下，位於貧窮偏遠地區的基督教群體和地方幹部往往因為過去的政教衝突和資源糾紛而存在着緊張的關係。趙文詞（Richard Madsen）研究華北獻縣的天主教群體，指出天主教早已在清中葉植根地方社會，成為當地的主流宗教和維繫宗族鄉村內部的凝聚力量。雖然在1949年後因中梵外交問題而經歷多場政治運動，但獻縣的天主教群體沒有衰落，反而隨着人口自然增長而有所增加。改革開放為教會帶來新的景象，如每逢特別的宗教節期，教徒會在村內村外舉行巡遊，展示強大的教會力量和網絡。地方幹部對這種大規模宗教動員力量存有戒心，因而造成緊張的政教關係。²⁹

五、結語

總括來說，九十年代以來海外從事中國基督教歷史研究的學者為數不少，研究的課題和角度不盡相同，但這些成果體現了一個共同取向，即從地方社會的角度研究基督教在華的發展和由此產生的衝突。這樣一種新的研究

27 May Ming-Chun Cheng, "Familism and the Protestant Expansion in China," *Ching Feng: A Journal o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41:2 (June 1998): 171-197; "House Church Movemen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1 (March 2003): 16-45; Eriberto Patrick Lozada Jr., *God Aboveground*.

28 Nicole Constable,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29 Richard Madsen, *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Beyond Orthodoxy: Catholicism as Chinese Folk Religion," i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eds. Uhalley and Wu, 233-250.

取向從多個方面改變了史學界對中國基督教歷史的理解和看法。首先，就研究範式而言，新的研究取向拋棄了傳統教會史研究中以西方傳教士為中心、以中國官方或精英反教話語為出發點的研究框架，九十年代的研究嘗試把傳教活動和反教活動放置在一個中國化的、地方社會化的具體環境之內，來探討中國基督教群體在面對國家正統文化變遷和地方社會內部危機時，如何利用基督教來重整地方上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並以新的面貌進入地方社會和國家政治範圍，鞏固基督教群體的既有利益。

另外，新的研究成果還在史料運用方面做出了大膽和開創性的嘗試，因為這一時期審視中國基督教歷史的視角已經發生變化，並從自上而下和中外之分的傳統研究模式中脫離出來，新的研究更強調利用地方史料和田野調查，目的在於深入了解地方社會上不同類型基督教群體的組織和內部聯繫，及他們跟國家權力的互動關係。最後值得指出的是，跨學科的研究取向和史料運用的多樣性也是這一代學術成果的特點。人類學、社會學、區域研究等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新成果和新方法都被廣泛地借鑑到中國基督教歷史研究之中，為我們進一步了解本土化的基督教教會歷史和中國地方社會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責任編輯：程美寶）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Joseph Tse-Hei Lee
Department of History
Pace University, New York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recent Western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urrent research shows a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ies from the fifteen to twentieth centuries, and in the us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official archival materials and fieldwork data. This trend reflects a move toward a micro-history approach that examines Sino-Christian interac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especially Christian evangelization, mass conversion, anti-Christian violence, as well as church-state relations. By highlighting Chinese grassroots society as the locale of religious interaction, scholars focus on the inculturation of Christian belief and ritual practices, the localization of Christian communities, and the dynamics of Christian networking. Throug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atest literature, this study discusses new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Keywords: Christianity, inculturation, localization, networking